

古代漢語在大學語文教學上的重要性

曾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語文是教學的重要工具，也是學生畢業後「學以致用」的重要媒介。因此，要檢查教學素質的良窳、教育目標能否達成，直接檢查學生的語文水平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辦法。¹

香港教育當局自 1973 年以來，發表了不下二十份教育報告書。²除了 1988 年的第三號報告書專門討論學校體制之外，幾乎每份報告都涉及有關語文教學的問題，而且都把這些問題放在報告的最前面部分。³可見當局在制訂教育政策時並沒有忽略語文問題。可以說，如果我們認為目前香港各大、中、小學積極重視語文教學問題的話，那麼這應該是最近二十多年來各類教育報告書所形成的大氣候的結果。

不過，我覺得過去對語文教學所做的研究或報告過於偏重教學模式或教學政策，很少談到教學內容一類問題。⁴對語文教學來說，前者屬於宏觀的布局，後者屬於微觀的安排，二者在教育規劃上不應該有所偏頗。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談中、小學語文教學，也不談教學政策或教學模式，主要從教學內容談古代漢語在大專語文教學上的重要性。

從概念上說，古代漢語相對於現代漢語，但二者都是漢語本身在時間上的變數，就像一個人的「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的相對一樣，兩者之間很難作截然的切分。在討論漢語教學的時候，應該重視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同一性和連續性，否則教、學

1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92 年發表的《香港學校教育的目的——諮詢擬稿》中也把讀寫和計算能力列為學習技巧。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編：《香港教育手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337。

2 在 1984 年以前，香港的教育報告書主要由港督委任的教育委員會提出，當時常被稱為教育綠皮書或教育白皮書；1984 年開始，該類的報告經常由教育統籌委員會（簡稱「教統會」）發表，名稱稱為《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幾號報告書》，到 1995 年 12 月教統會一共發表了六號的報告書。不過，也有由別的組織發表的報告書，例如 1989 年的《檢討提高語文能力措施工作小組報告書》，就由教育署提出。

3 見《香港教育手冊》第 11 章「重要教育文件選輯」。

4 以最近的事件為例，將於本年內成立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委會」，其優先處理的工作包括「研究本港兒童學習中英文的最佳學習模式；按目標為本課程訂立小學語文學習的學習目標；檢討學能測驗是有助或妨礙學生的語文水平；研究學校課程內，普通話科與中文科的關係等」。見 1996 年 3 月 8 日《明報》G8 版專訊報導。

現代漢語便變得支離割裂而不能加深加固。以下是我對古代漢語在當前大學語文教學上的看法：

一、加深或幫助學生對母語的理解

由於語言必須著地生根，使用在一定的地域內。當經歷一段長時間後，它會在該地域內形成了分化和變異。所以古代漢語不但在時間上是各現代漢語方言的前身，在空間上也繁衍為各個現代漢語方言，這是古代漢語和各現代漢語方言之間複雜的遺傳連鎖關係。換句話說，任何現代漢語方言，其內部和古代漢語都有緊密的血緣關係，可以在古代漢語內找到共同的地方和某些源頭。這是古代漢語的超方言特點。所以不但現代方言學家研究方言時要參照古代漢語，各地學生——尤其是高等學校的學生——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自己的母語，也要學好古代漢語。以廣州話為例，廣州話無論在語音、詞彙、語法層面的費解部分，很多都可以在古漢語中找到源頭。例如廣州話「媳婦」叫做「心抱」，一般人覺得很難理解，其實它就是古語詞的「新婦」。由於「婦」字保留了古代漢語的雙唇音 b（中古的「並」母），所以在連音時把「新」字的單唇韻尾 -n 改變為雙唇韻尾 -m，發音就和「心」字一樣。現在一些常唸錯的字，例如緋（有的唸成匪）、愉（有的唸成遇）、誼（有的唸成移）、刊（有的唸成罕）等，都可以根據古代的反切更正。

詞彙方面，廣州話更大量保留了古漢語的特色。⁵ 廣州話口語中的「昨日」、「今日」、「卒之」且不說，香港學生寫作中大量使用的「之」、「亦」、「甚」、「極」、「將」、「食」、「行」、「返」、「住」、「若」、「或」等字眼，也是古漢語的常用詞。這些詞語大量在學生的寫作中出現，嚴重影響了寫作的外觀。如果在教學上能夠讓學生知道廣州話詞語這種古老特色，並且指出上述字眼的時代色彩和對應的現代漢語，那麼學生不但在寫作時詞彙上多一種選擇，也多一層認識，對於提高語文程度和學習普通話也有幫助。有時，口語語音的錯誤也和古漢語知識不足有關。「因應」、「穩當」、「品行」、「消長」等詞語，後一成分的讀音與日常的讀音不同，學生經常讀錯，只有了解它們的古代意義才能讀得準確。

學生古漢語詞彙的知識豐富，不但可以增加對母語的了解，在學習和使用成語時也容易得心應手。語文教學的目的，除了程度提高之外，優雅地使用語言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要求。成語知識往往是考核學生這兩方面的一個指標。有些成語，例如「不速之客」、「日出而作」，由於常用的緣故，早已成為廣州話的一部分。學生在古漢語基礎不好的情況下，使用成語只能囫圇吞棗。他知道「不速之客」的整個意思和用法，可是絕大部分的大學生都說不出「速」字是甚麼意思；甚至連「日出而作」的「作」字只能

5 詹憲慈的《廣州話本字》主要是研究這些廣州話詞彙的古代寫法，該書 1995 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了解為「工作」而不知道它的古代意義。⁶ 前者的不理解，容易造成學生對成語的神秘感和不合情理(不快速的客人?)的錯誤印象，結果對母語不甚了了而產生疏離感；後者的誤解，讓學生使用「日出而作」時只能拿來形容現代都市人的忙碌生活，卻不知道它用來描寫簡單而自然的郊野農村生活更恰當，結果使用母語時少了妥貼的感覺。有時，古漢語的詞彙知識除了讓學生了解母語之外，還能幫助學生學好現代漢語。舉例來說，「走難」這個廣州語詞，由於跟規範現代漢語「逃難」的詞形詞義有一半相似，學生不容易寫錯；但遇到「走堂」這一類詞形詞義都不同的常用詞時，學生要寫出規範的對等詞就有困難。筆者曾經在語文班上做過試驗，要學生寫出廣州話「走堂」的規範漢語。結果能寫出「逃課」的人不到5%，其餘錯誤的人之中幾乎有一半寫「缺席」，有一半寫「曠課」，極少數寫「請假」。對於本地學生這樣一個常用語詞「走堂」來說，寫得準確而規範的人這麼少，並不是因為這個詞語的意義深奧，離開學生的生活圈太遠，而是因為在「走堂」這個廣州語詞中，「走」字保留古代漢語詞義，學生在不明白這個語詞的古代意義時，便妨礙他們使用規範和準確的漢語表達。

此外，語法雖然是語言中比較穩定的部分，在長遠的歲月中，廣州話也保留了古代漢語演變後不見於其他方言的古老語法。了解了這些古老語法之後，不但對廣州話的理解會加深，對學習整體漢語和提高語文程度也有所幫助。舉例來說，廣州話的「唯你是問」是一個常用的短語結構，若不知道它是《左傳》中常見的「唯×(名詞)是×(動語)」句式(例如宣公十二年的「唯命是聽」)，本地學生一般不易知道這個短語的寫法和解釋。一旦明白這是古代語法的遺留之後，學生不但知道「唯你是問」和成語「唯利是圖」是同一結構，而且也知道它的解釋是「問(追問)你」的意思。

二、對正字和寫作的幫助

學生寫錯字可以分為筆畫錯誤和用字錯誤兩大類，後者又叫寫別字。在高層次的語文教學裏，正字主要是針對寫別字的問題，因為筆畫糾正只能算是基礎的教育工作。學生寫別字的原因，除了識字量有限之外，很多時候都是語音或詞語混淆而引起的。按常理說，學生接受高中程度語文教育之後，識字量已大大提高，不再輕易會寫別字，很多時候寫別字都是因為詞語混淆而造成的。⁷ 在詞語混淆的因素中，經常都是古漢語的知識貧弱而產生的。這類例子常見的有把「凌晨」寫成「零晨」的，把「因素」寫成「因數」，把「憑藉」寫成「憑籍」，把「車廂」寫成「車箱」，把「姓名」寫成「性名」，把

6 「不速之客」見於《易·需卦》：「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日出而作」見於《莊子·讓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簡明古漢語詞典》把「速」解釋為「招請、邀請」，把「作」解釋為「起來」。分別見張永言等(編)：《簡明古漢語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48，981。

7 目前本地學生因同音而引起的錯別字例子也頗多，例如「擦、刷」「搞、攪」等在廣州話中同音，容易引起混亂。但這些例子以現代漢語解釋比用古代漢語解釋來得方便，所以本文不談這類的錯別字。

「合乎」寫成「合符」；有的甚至「期間」、「其間」互混，「以致」、「以至」不分，「需」、「須」混同。這些都是語文水平不高的表徵，病因並非由識字不足引起，因為這些都是簡淺的常用字；若要糾治，則非從古漢語知識下手不可。

加強古漢語教學，不但可以糾正錯別字，也可以有助於學生的寫作能力。因為古漢語和各現代方言雖然都有血緣關係，但它的超方言特點主要還是表現於書面語而非口語。所以在本世紀初國語運動尚未推行之前，操各方言的人之間語言不通，但可以用筆（就是寫古漢語）互相交談。古代漢語在今天仍然保持其書面語的優越性。譬如在隆重的典禮上，在官方的言辭裏，在重要的文件中（例如畢業證書），使用古代漢語會增加其典雅莊嚴的氣氛，這是現代漢語所比不上的。另外，古漢語的構詞法也比現代漢語簡潔靈活，在寫作上很值得現代漢語借鏡。例如古漢語有一種「介—動（介詞詞組加動詞詞組）結構」經常省略了介詞，成為簡單的「名—動結構」；結果字面乾淨了，意思仍然飽滿。這類例子有「以筆記→筆記」、「於路祭→路祭」、「於山居→山居」。現代軍事、科技術語模仿這種構詞法很多，例如「野戰」、「巷戰」、「游擊」、「電動」、「電解」、「電傳」、「機動」（遊戲）等都是。古代漢語中又有一種偏義複詞，其結構由兩個反義詞合成，但使用時只選其中一個詞義。例如「始終」（選終，即終於）、「利害」（選利，利害關係即利益關係）、「舉止」（選舉，舉止溫文即舉動溫文）、「輕重」（選重，舉足輕重即舉足重要）。這些結構用在辯論或議論時，往往使辭鋒加倍有力，生色不少。現代漢語的「死活」、「早晚」、「得失」、「多少」、「恩怨」（或恩恩怨怨）、「沒大沒小」等說法，都是模仿這種結構而來的。對寫作的人來說，在現代漢語「辭窮」的時候，這些古代漢語的構詞法往往可以濟一時之急。資深作家往往兼長古代漢語，就是因為經常要取資於古代漢語的緣故。

古代漢語的某些特殊語法，在今天已經不存在於現代漢語裏頭，可是如果我們對古代漢語有一定認識的話，其中一些消失了語法，在恰當的情形下，還可以拿來活用，使現代漢語不至過於受口語的限制。古代漢語的使動用法就常被人拿來活用。例如「豐富」本是形容詞，可是在模仿古漢語的使動用法時，它可以作動詞用：「學習古漢語，可以豐富我們的語文知識」（使我們的語文知識豐富）。⁸ 古代漢語省略複詞詞頭的做法，例如把「老者」說成「老」（扶老攜幼），把「世人」說成「世」（與世無爭），今天的報紙、雜誌還繼續沿用這種語法來寫標題，使版面乾淨利落。例如報導足球比賽的標題「我（隊）大勝美（國）四比一」（括號中的兩個字都可以不寫），就是常見的例子。

三、增加閱讀古籍的興趣和欣賞文學的能力

現在我們大概已經可以隱約看到，大專學生的完整語文能力應該包含古代漢語和

8 趙元任在六十年代認為「豐富詞彙」是一個新近形成的短語，見《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頁309。

現代漢語兩部分，而且這兩部分是不容分割的。因為現代漢語是古代漢語沒有分割的延續，二者之間很難劃清界線。提倡白話文，並不等於揚棄文言文。所以在白話文運動之初，胡適和梁啟超等人都曾大力提倡中學生唸古書，並列出一些最低限度的書目。時移世易，今天要學生多唸古書是不合實際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絕口不提；取而代之，我們可以把唸古書的要求改為古代漢語的教學，讓學生在短期內理解古代漢語的特點，掌握使用和閱讀古代漢語的基本技巧；否則學生的語文知識無論怎樣長進，只要缺少古代漢語這部分，其能力始終是不完全的。所以，大家在今天呼籲提高大專語文程度的同時，是不容忽略古代漢語的。否則，今天中學的古漢語課程在大專教育裏得不到銜接，而文科以外古漢語基礎原來不錯的中學生進了大專學校也就沒有進階的機會，整個中學語文教育的計劃似乎失去整體配合的意義。

從教育的角度看，要學生養成良好的語文習慣，閱讀是重要的一環。閱讀的範圍越廣，學生的得益越大。學生只能看白話文，不能看文言文，無疑放棄了中國舊有文化的有用部分；對身為中國人的大專學生來說，在中學階段又接受過幾年的古漢語訓練，這實在十分可惜。何況大專畢業生是每一門學科的前線工作者，他們要面對每一門學問的前線問題，如果在已有的漢字、漢語基礎知識上加上進一步系統的古代漢語教育，很快便有能力直接閱讀古書，直接吸收古人的智慧，對他們怎樣去融舊創新，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離開實用的觀點，從文藝的角度看，學生有能力直接看古書，其實等於直接接受古代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等學者的薰陶。中國現代文藝從五四時代開始，到現在還不到八十年，累積有限，學生要從文藝作品上得到教育，擷採精華，離開古代典籍不易為功。在文學上，為了達成文學效果，古代漢語在這方面更是言簡意賅，有更多的語法變化。有的省略了動詞，有的隱含主語，有的句子轉折變化。馬致遠《天淨沙》的「枯藤、老樹、昏鴉」且不說，即使最近電視臺連播的《三國演義》本地版主題曲中「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的歌詞，都需要有古漢語的基本修養才能聽懂其中真意。若不明白古代漢語的情況，就很難準確地知道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大專語文的古代漢語教學，目的是使學生有閱讀古書的能力，⁹進而培養成閱讀古書的興趣，甚至於培養出欣賞古典文學的能力。否則學生只有在畢業之後靠自己獨力摸索，這樣閱讀古籍，遇到的困難和誤解一定很多。

四、有助於各學科專業的研究和開拓

上文已說，大專學生是各門專業的前線工作者，而在中國古代書籍中，各門學問都留下大量的文獻，可供現代人參考。英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能夠寫出大部

9 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修訂本)序文中也提到，「許多高等學校都重新考慮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以爲它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見該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

頭的《中國科學技術史》¹⁰(*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因為有大量中國古代科技文獻作為參考。李氏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們在大學裏施教的科目，大多數都可以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找到相關的資料。其中文學、歷史、語言、藝術、醫藥、數學、天文、建築等方面的古代資料，過去最受人注意，而且做了相當可觀的研究，但還是有很多未被人充分利用；此外，近年地下出土的材料很多，其中不乏與醫學、法律、曆法、歷史、哲學有關的材料，至今只有少部分被人利用過，大有開發的餘地。但地下材料的運用，需要有更多的古漢語能力，中學的古漢語教育還不足以應付，必須在大專階段加強訓練才行。

五、古籍的翻譯和研究

這方面的需要和上面一點是相關的。因為當一個專業人員進入古籍的世界之後，他也許會發現很多有用的材料。這些材料有的適合入門者閱讀，有的適合專長者鑽研，有的適合相關學科參考。為了擴大這些材料的影響並引起重視，翻譯是必要的工作。可是翻譯能力不足，足以影響這些資料的價值。翻譯和研究，是互為因果的。好的翻譯，促進進一步的研究；同樣，有深入研究的語文基礎，就會出現完善和準確的翻譯。但無論翻譯和研究，都需要基本而健全的古漢語知識，否則很難有可靠的基礎。有了可靠的翻譯作品，古代漢語的教學才容易帶動起來。綜觀今天香港的大專語文教育，在提高語文水平的呼聲不絕於耳的時候，似乎還在兩方面忽略了古代漢語：第一是古代漢語科目的開設不足。在本年度各校的課程表裏，只有在嶺南學院中文系第二、第三年的選修課程中才找到各佔一學期三學分的「古代漢語」課程（課程編號名為 CHI 2690 和 CHI 3690），而在浸會大學中文系編號 CHI 1120 的「漢語語法」(Chinese Grammar) 的課程描述中，有這樣的說明：「科目內容著重在古代漢語方面，藉以提高學生正確了解古書的能力，為將來從事古典文獻研究或者中文教學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¹¹ 這個課程的開設目的，和本文的觀點頗一致，只可惜這類課程目前並不多見。第二是有關古代漢語的翻譯課程嚴重缺乏。香港在過去十幾年間，對翻譯不能說不重視，各大專院校設有翻譯系和翻譯課程，可是主要集中在翻譯理論和中英文的對譯；對於古漢語的翻譯課程，至今好像還不曾有人開課。無論在理論水平或是從實際層面的角度來看，古漢語的翻譯課程是值得嘗試的，否則古代漢語

10 譯名以該書 1956 年英語版的扉頁中文題字為據。

11 見《香港浸會大學行事曆 (Calendar/Bulletin) 1996》，頁 267。又目前各大專院校，基本上都開設或準備開設一些選修的語文課程，但主要都以現代漢語或應用課程（包括普通話課程）為主。我覺得，為了提高或補救學生的語文水平，只開現代漢語或應用課程是不足夠的。舉例說，在我所教的行政中文班上，有些學生連信封上的「台啟」和信首語的「敬啟者」也分不清楚，以這樣的基礎學應用文，到底有沒有效就很難說。以上我對本地大專院校中的古代漢語課程的調查是初步的，而且不包括師範學校的課程。

的教學或研究只流於空泛，不容易產生實效。因此，這問題值得關心大專語文教育者共同注意。

六、跟古代文化的關聯

古代漢語作為歷史事物，其教學效果就跟一切的歷史事物一樣，和古代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其實古代漢語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在理論上，為甚麼我們要學習古代漢語，答案應該和為甚麼要學習歷史一樣，都是有助於對目前狀況的理解。語言和文化的關係本來是密不可分的。在學習古代漢語的過程中，包含不少名物制度，和現代生活有關；在學習古代漢語時，若不設法從文化的層面把它們弄清楚，學習古代漢語就變得很無聊，常感到被古人愚弄而不知所措，甚至不了解現代人的用語。這些古代文化部分，若不在古代漢語教學中處理，學生也不易在別的地方學到。舉例來說，古人經常提到千里馬，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種馬呢？

這樣一問，問題顯然不純粹是語文問題了，它已經進入古代文化的領域。古代漢語和古代文化的關聯往往就是這樣密切的。我們要解答這問題，必須從古代的度量衡制度著手。當我們在學習古代漢語時弄清楚古人的一里等於半公里之後，千里就可以折算為五百公里。若馬跑的速度每小時五十公里（大約等於鬧市中的公共汽車車速），一天差不多要跑十小時。以動物的體能來衡量，一天十小時工作並不是不可能的，於是千里馬的神秘面紗便揭開了。明白了千里馬的事實後，古人有關萬里長城的計算不合理就更容易搞清楚了。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之後，假如到國內旅行，聽到當地人說從這裏到火車站要走三里路的話，便不會感到茫茫然。這是古代漢語和古代文化的關聯，有時這種關聯還延續到今天。

古人的姓名也是同類的例子。我們知道，過去的人有名有字；名是卑稱，字是尊稱，¹²這也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們雖然不再生活在這種環境，可是也有必要掌握這種知識，否則我們在指稱古人（特別是那些在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固定地位的古人）的時候，不知道怎樣對他們表示敬意。只有明白了古人姓名的文化，我們才了解現在有人稱「詩仙」為李白，有人稱為李太白；有人稱「國父」為孫文，有人稱為孫逸仙或孫中山，二者之間有甚麼分別。同樣，中國人的親屬概念和稱呼跟外國人不一樣，這些差異對一般學生來說，如果不在古代漢語中學到，在別的科目中更是難以學到的。可見古代漢語和古文化的關聯並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大學生應該掌握這些基本知識。

七、跟整體漢語的關係

以上所說都是離開語言本身就某一點功用說的。從語言本身來說，古代漢語雖然

12 《白虎通義·姓名》：「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

是漢語的一部分，但卻和整體漢語有密切的關係，不容易分割。所有的漢語詞典，包括現代漢語詞典在內，都很難把古漢語部分撇除，就是明證。很多漢語的問題，包括語文教學問題，其癥結都在古漢語方面；若能從釐清古代漢語著手，就有如順藤摸瓜，挈領頓裘，其順者不可勝數。所以當今要提高大學生的語文水平，不能不重視古代漢語教學的作用。

筆者最近在《語文建設通訊》上看到有關周有光評論日本人倉石武四郎的《岩波中國語辭典》的文章，周先生認為倉石武四郎創造性地衡量詞的「硬度」，把漢詞詞匯分為 11 級(rank)，具有「首創性、科學性和實用性」。倉石所分的漢語詞匯 11 級，以普通語詞為 0 級，甚餘從「文」到「古」分為上 5 級：上 1 級(廣播、講演用語，如：不但、開始)，上 2 級(文學作品用語，如：陰暗、瞭望)，上 3 級(學術用語，如圓周率、唯物史觀)，上 4 級(較常用的文言詞，如：枝頭、飾詞)，上 5 級(罕用的文言詞，如：史冊、牧民[治理人民])。從「俗」到「土」分為下 5 級：下 1 級(北京口頭語，如：開火兒、反勁兒)，下 2 級(北京土話，如：露怯、翻鍋)，下 3 級(特殊社會用語、隱語等，如：票友兒、口兒上)，下 4 級(罵人話等，如死王八皮、蠢個兒)，下 5 級(流入北京的方言等，如拆爛污、呀呀唔)。¹³ 周先生對倉石氏這種做法在漢語規範化和編訂漢語詞典方面的貢獻，還有很多精闢的意見，我們在這裏不必全部引述。只要我們注意到倉石在他的字典中排列的次序是從上 5 級排到下 5 級的話，縱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分級意見，但也還是看到，他這樣做已經充分發揮和肯定了古代漢語在整體漢語中的地位。

在語言中，語音和語法都有規律性，比較抽象而且數量不多，容易掌握；相對來說，詞彙顯得比較具體，而且數量龐大，是語言教、學的主要部分。我們要提高學生的語文程度，除了語音、語法有法可循之外，詞彙問題大概只有下死工夫，讓學生知道每個詞彙的詞義色彩、價值(也就是倉石的「級」)、規範等，才容易學得好。我相信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借助倉石的意念，重視古代漢語，是很難有成效的。

現在要提高大學生語文水平，我以為，除了在高等教育的層次上提高外，還要考慮到和中等教育的語文教學銜接。如果中等學校的語文教育以現代漢語為基本的話，那麼高等學校的語文教育是不是應該注意提高學生的古漢語知識呢？所以無論編詞典要評價整體漢語的詞語或教育上要規劃整個語文的教學進度，古代漢語的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視的。

13 見《語文建設通訊(香港)》第 50 期，1995 年 12 月，頁 96。原文標題為《答讀者：關於〈岩波中國語辭典〉》，原載《抖擻》(香港) 15 期，1975 年 5 月，頁 92-93。上述 11 級在周先生引用時次序略有調動，倉石原書的排列次序為：上 5 級、上 4 級、上 3 級、上 2 級、上 1 級、0 級、下 1 級、下 2 級、下 3 級、下 4 級、下 5 級。見《岩波中國語辭典·序說》(東京：岩波書店，1963 年)，頁 16。可見倉石是把文言詞排到最高的。